

列寶與世地

伍光建譯



地甘與甯列

著 勒 密 普 勒 孚

譯 建 光 伍



LENIN AND GANDHI

by

Rene Fülöp-Miller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Library
Mukden China

列甯與甘地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實價大洋二元八角

著者 孚勒普密勒

譯者 伍光建

發行者兼 華通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中段

虹口分店 上海北四川路底一路電車終點

中華民國十九年六月初版

LENIN and GANDHI
by
Rene Fülöp Miller

譯者序

第二十世紀一開幕，就有兩個大人物登場，作驚天動地的事，要改變同數千萬人有關係的生活；還許衝出範圍，鬧到鄰邦裏去。這兩位大人物，就是列甯和甘地。他們的見解辦法，卻絕對的不同。列甯要用西歐改變俄國。着急到了不得，恨不得同變戲法一樣的，一夜工夫就要把俄國變作美國的超支加哥，遍地蓋幾十層的高大房子。國裏無論什麼地方，不管是窮鄉僻壤，都要用電氣，用機器。見得深透的人們說，列甯還是俄國彼得大帝的功臣，彼得大帝開其端，列甯竟其緒，故此他雖恨極俄國諸帝，卻極崇敬彼得大帝。他一來爲報兄讎，二來爲要立刻辦到歐化，所以把什麼帝制資本主義，還有各種社會主義，全打倒了。誰知他的主義行不通；他向來都是頂執拗的，到了這個時候，卻立刻改變過來，掉轉面目，變本加厲的，實行資本主義所用的方法。後來會不會相變，變得好，或變得壞，我們卻不敢說了。

甘地卻恨極了歐化，尤其恨的是機器，看得比洪水猛獸還要利害得多。他樣樣都要復古，家家戶戶，不問男女大小，都要實行手織織布。他每日要湊出工夫織布。在監獄裏也織布，列寧辦這件大事，本心雖不好殺人，卻敢於殺人，他還說利劍在手，不肯殺人是會受天譴的。甘地卻極力反對武力抗拒，還到處勸人戒殺。他一味用空和手段，用睡面自乾態度，在印度卻辦得如火如茶，聲勢浩蕩，使哲學家尼采聽了，又不知要說些什麼。印度種族既多，教派又雜，甘地卻能夠打成一片，這裏頭卻有許多可貴的消息。甘地卻並不想破壞資本主義，只想改變其形相。最奇怪的是，列寧雖痛恨宗教，誰知他一死之後，就生出許多神話來，鄉下人都相信他未曾死，相信他將來不久就要復活，我不曉得，假使列寧有知，當作什麼樣的感想。甘地一出場，國人就相信他或是一位神人，或是一位使徒。羅曼羅蘭說他是一位只見十字架的基督，列寧本來是一位哲學家，作者製傳，居多當他是一位哲學家，後來他忽然折回資本家主義的辦法時候，卻稱他有大政治家的手腕。甘地卻很近一個宗教家，但是從經濟學方面看來，作者卻許他是一位較為偉大，較能實行的經濟家，有過於列寧。甘地雖用和平手段，卻屢次對國人說過，我們若不預備見死不怕，我們還是不能完全自由。他又極力主持政教不分離，他說，政治之才，與道德分離，就是各國政治退化諸多原因之一。他的政治眼光，是不錯的。好在作者所下的斷語，都是引這兩位偉人的同志們朋友們的話，還不失為公道。（列寧所用的陰謀

介 紹 文

這本書的目的，是要實寫兩個人的生平和事業。作者以爲這兩個人的人格，最有力量使今代的精神得有具體化。列甯甘地所以示教的諸多觀念，和他們所說的話，所作的事，很可以給後人以更爲顯明的證據，過於勿論那樣別的事體所能給的，證明我們這個時代的許多動機，在什麼區域裏，完成了永久的事業，不能夠副我們期望到什麼程度。後人特用列甯甘地兩個人的事業的標準，量度我們這個時代的指示。這兩個人所作不到的事，將證明我們這個時代的可悲的能力不足。既是這樣，我們這個時代不惟還要努力達到不能達到的目的，而且更要達到古時所提倡的諸多烏托邦（Utopias）的具體化。

人類久已存養着許多夢想，列甯和甘地各以其道擔任英雄事業，這種事業，同時又冒險要試行人類的夢想。他們兩個人的根底都深入於他們的民族中，他們的諸多改革和方法整個都是他們兩國的諸多

命運的結果，是俄國與印度的諸多情形的諸多限制的結果。而且當他們努力的時候，正在這兩國走到他們民族的發展的特點的時期。但是這位俄國人和印度人的許多政治的冒險事業，都遠出乎本國的和暫時的狹窄的界限之外。俄國同印度不過是身受重大而普遍有可行之道的試驗之國，若行之有效，將給一個模範與世界以推行這兩位改革家的諸多新學理於全球。列寧甘地兩個人都是被一種狂熱的深信的情緒所維持的。他們深信俄國和印度都是奉命挽回人類的。

所以這兩個人所說的話都有迷人的力量，同時還有一種福音的擾人的拒人的自大。這兩位站在第二十四紀的開端，如同兩位前知家一樣。我們若是聽他們的話，他們的時代就是世界歷史的一個新紀元。這兩位改革家願用不同的方法，引入類入於得救之境。但是他們所指的方向，正是相反的。各人的動作卻都表現最深的相信。列寧以為無限度而不過是暫時的用暴烈手段，是產生一個理想世界的方法；甘地卻不是這樣，他絕對的拒絕用暴烈手段以達目的。列寧嘗試完全用機器化的方法以解放人類；甘地卻拋棄機器主義。列寧當機器是救民出於水火的，甘地卻當機器是魔鬼的迷人方法。

表面的諸多不同雖是這樣，但是他們有很深遠的相類，和公共的精神的原始，我們隨處都可以看得見。他們顯然相似的生活，表現這種相類和原始少，表見於他們諸多不同之處的，尤為顯明。他們兩位都是

產生於大反叛的種族，在他們諸多相似之內，和在他們諸多不同之內，都有聯合他們的要點，就是說他們都被這同一的大試驗所激動。他們同屬於一個擾亂及於最深的諸多基礎的時代，在這個時代，人的需要和困苦起首感動人，不獨令人發生一種不活潑或有友誼和慈善的憐憫，而且令人發人真正的哀憐（同情）。由此就令人曉得，無論那一種罪惡，都是人格的責任，所以必要叛亂，以反對現在的政治和社會體制。他們對於全數無產階級的痛苦，都有極深的感覺，都引以為己責。所以這兩位大領袖所說的話就有了逼人的力量。他們所作的事就有了分量，他們就有了推倒一切的勢力及於羣衆。

列甯親身與被受壓制的人們同處，同他們過一樣的生活，分任他們的愁困，同他們一樣的被禁在監獄裏。他根據於他們所受的諸多不公道，以造成他的學理，他從他們的靈魂裏沸騰的怨恨，取得他的勢力。狄克提陀列甯（Lenin the dictator）原是一個無產的民族的籲懇的結果。自從那一天他用民衆的名義，入居克勒謨林（Kremlin）宮，奪得管理俄國的權力，這個無產業無可赴訴的羣衆，從此就經過列甯的手，起首治國了。他們的起訴就變作新的政治理想。他們貪得權力，就產生國家的野蠻機器，他們的不說出來的諸多本能，就規定新社會組織的倫理。這種倫理是否能夠接連存在，似乎很是一個大疑問。

相同的歷史現象，亦發生於印度，其不同之處，就是另一種教育和另一種國情所自然產生的不同。

地也過受壓制的人們的過活，也同他們一樣的受屈辱，受監禁。甘地每次告成功，那數不盡的千百萬的受壓制的印度人也贏得勝利。甘地起來，他們的權力也起來。當印度人民請甘地作狄克提陀（Dictator）的時候，身為奴隸的印度人，當了控告異族諸法權的原告，那被人蔑視的賤民（無階級人，社會所不容的人）當了控告驕傲婆羅門（Brahmin）的原告。俄國印度的窮民們的呼號和控告，到了這個時候，第一次取得一種具體的人格化的權力，在相等的諸多條件中，與仍然存在的舊制對抗。這個無個人性的千百萬人所造成的羣衆的面目，是向來無人見過的，到了今日卻造成列寧和甘地兩個人的面目。這兩位大人物的面目是很嚴厲的，這兩個面目將深印於無論什麼時代的歷史上。

俄國福音和印度福音雖有差別，卻有相同的精神，都起訴歐洲教化。這張訴辭是兩個人遞的，但是我們卻不能不承認有道德的權力和誠意，深伏於他們的嚴厲之下。他們所說的話，我們不能不顧。

但是洲歐卻不能承認列寧和甘地的控辭，同時既是判辭又是訴辭，因為他們的控告與全數的控告相同，都是一面之辭。亞洲用印度人和俄國人所說的話，振刷精神反對歐洲，亞洲有幾方面可以勝過我們歐洲人，但是惟有歐洲能夠奮鬥到承認一條真理。這條真理說的是原告絕不能同時又當裁判官。

所以歐洲將聽兩個原告的說話，將來卻能夠自覺的拿辯護辭以反對這樣貶斥的判辭。歐洲就是拿

一個根據於人格的道德自由的一種豐富而繁複的教化，以作辯護。因為西方曾曉得怎樣把來自東方的全數重大觀念變作他自己的性情的一宗新而有機體的豐富。

作者嘗試給讀者以列甯的性格和事功的一副可靠、客觀的和真正的圖畫，可惜可以取用和引證的材料太少。因為有多數討論列甯的著作，都是顛倒這位俄國狄克提陀的爲人，不是過於無批判的恭維，就是存黨見的厭惡。好在作者於本作之末，所引的諸多著作之外，還能夠有所增加，大約都是得自在蘇維埃俄國所得的諸多印像和閱歷，也有得自文牘的，又有得自與列甯有關係的人的談話，這種人都是列甯從少年時就同他發生關係的，也有追隨他當同志的，也有是在政治奮鬥中，同他作敵對的。

至於描寫甘地的畫像，作者多半用印度所刊行的甘地的著作，演說和函牘，還有「少年印度」和「流行思想」兩種報章的材料，還有印度反對派的著作和小冊，況且還有洛涅格（Emil Roniger）的甘地著作的德文選本。這是一種可以作模範的校刊，其中供給我們許多有價值的隱示。

作者不必說他曾研究過羅曼羅蘭（Roman Rolland）的名作，和其他討論甘地的著作，尤其是巴拉加爾（Hans Prager）所撰的宏深著作。作者因為研究甘地的學說與佛教的關係，曾採用訥伊曼（K. E. Neumann）所譯的「佛說」略編和長編都會採用。

列甯傳 題詞

——引列甯致科爾基(Gorki)書中語——(譯者註：參看本書第六章末段)

「我所曉得的，沒有比“Аппassionata”樂率更好聽的，我天天都能夠聽見。這是異常的，非人間所有的音樂。我每次聽見這許多音調，我很得意的想，人力所能做到的事，是很能使人驚異的，我這樣的時候，也許還帶點孩子的天真，但是我不能常聽音樂，因牠會影響我的腦筋。人們能在這個污濁地獄裏創造這樣的美，我要說幾句能悅人的傻話，摩挲他們的頭，但是今天不是摩人們的頭的天；今天人們的手降格去打破頭顱的日子。我們的最後意想，原是反對全數暴烈舉動的，今天卻不能不毫無憐憫的打破頭顱——這是一件如同地獄那麼無情的苦事……」

第一章

一八八九年在薩麻拉(Samarra)地方開一個賑饑委員會，其中有一位「被派下來」的少年學生。委員們正在那裏很着急很熱心的討論應該用什麼賑濟的方法，災象蔓延，這時候是愈變愈令人可怕，那個不知名的學生，站起來說：『救濟災民就是一件罪過，因為全數賑饑辦法，不過是幫助俄帝派的威勢罷了。』衆人聽了這句話無不聳然。『災象愈重，我們反該歡迎，因為這樣一來會令官吏們發生爲難，有助於推翻現存的制度。實在的不良就是現存的制度，只有把這種制度推倒了，纔能夠一次過的，使將來永遠不再發生饑荒。』

這是十九歲的列甯所說的話，這時候已經包含他後來的學說裏全數的最有特色的要點。從前的人們聽見了很覺得詫異；在後來三十年中，列甯心裏只有這一個主意，還是同少年時一樣的。不管他的諸多